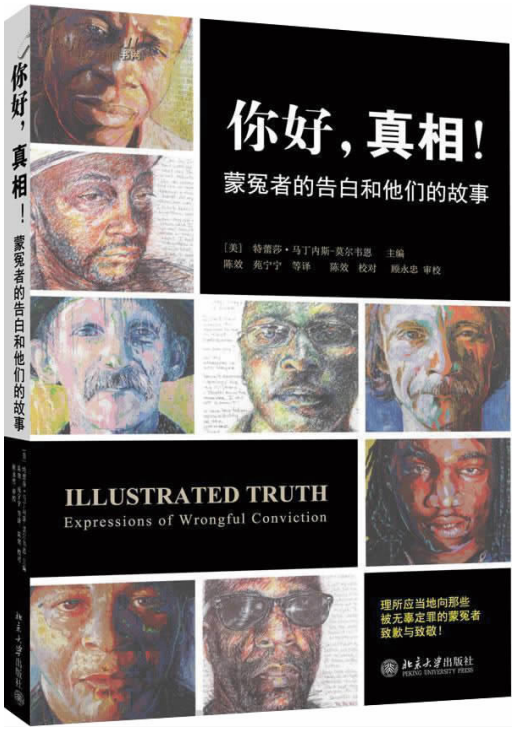


被偷走的公正



《你好,真相!:蒙冤者的告白和他们的故事》
特蕾莎·马丁内斯-莫尔韦恩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年7月的一天,18岁的阿提夫·拉斐和朋友萨巴斯蒂安·伯恩回到家中,发现父母和姐姐均遭杀害。报警后,他们接受了警方测验、搜查和审问。美国警方没有从他俩的身上或衣物上发现血迹、骨头或组织。在犯罪现场的DNA发现也与两人不匹配,证据显示至少有三人参与了谋杀。

美国警方在谋杀案发生9个月
后,依然没有发现其他有效证据,于是发动了一次卧底行动,便衣警察伪装成暴力罪犯,用15周时间将拉斐和伯恩斯拉入一项犯罪行动,再依照卷入该次犯罪的其他人的供述,将前二者定罪。拉斐和伯恩斯最后被判处终身监禁且不得保释,但他们一直没有放弃上诉。

阿提夫·拉斐在服刑中,写下了一篇长文《在自由的边缘》。文中表达了他对自由、尊严、真相、正义的渴求。他直言,自己陷入苦难不影响对苦难的思考,更不会使自己退步,“任意地拥抱痛苦”成为“梦寐以求的伦理性需求”。他希望自己,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受到冤屈的人们,“能坚持住被抛弃、疾病、虐待、羞辱的苦难——我希望他们不会自我轻视,即不自信的折磨和他不能克服的痛苦”。

《在自由的边缘》被收入《你好,真相!》,这是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法学院院刊《自由中心杂志》以特刊形式推出的一本讲述刑事冤案的图书。全书收录了几十年来发生于美国的48起刑事冤案,从蒙冤者的视角再现了案情、冤情、使得部分蒙冤者洗脱指控和判决罪名的过程、让另外一部分蒙冤者在冤情大白却依旧无法获释的情况。

出现在《你好,真相!:蒙冤者的告白和他们的故事》一书封面上的几个人物画像,正是上述冤案中几起案件的受害者的影像。他们(她们)是无辜的,有犯罪发生时不在现场的人证、物证,根本没有实施警方指控的罪行,最终得以通过DNA基因图库监测的排查而重获清白——但这些并不影响他们(她们)被捕入狱并定罪。正如阿提夫·拉斐在《在自由的边缘》一文中所痛陈指出的,他们是如此相信正义,相信法律的公正,如此渴求自由和尊严,却因为一些可笑的理由而最终失去自由、名誉乃至整段人生,代价是极其惨烈的。

《你好,真相!:蒙冤者的告白和他们的故事》一书的姊妹篇《冤案何以发生:导致冤假错案的八大司法迷信》,由美国俄亥俄州前检察总长、该州洗冤工程发起人之一的吉姆·佩特

罗所著。吉姆·佩特罗列出了制造冤案的八项司法迷信,包括司法机关对刑事重案嫌疑人的有罪推定思维,并因此忽略嫌疑人提供的无罪自辩乃至关键证据;漫长的审讯、法庭审判会让许多嫌疑人苦不堪言,在审判人员的诱导下作出自证罪行的虚假供述;公众和司法机关往往宽容冤假错案的办理者,认为错案责任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过度信任目击证人的证言,等等。吉姆·佩特罗还指出,一些案件中,包括法官、警察也觉得给嫌疑人定罪,存在较大疑点,但却下意识认为,如果无法准确判定谁是真凶,将在押的嫌疑人定罪,等于是给受害者(家庭)、社会公众一个交代,先应付过去再说。但美国司法体制的纠错效率并不高,一旦冤案定判,再要纠偏,难度和代价都太大了,办案机关宁可相互包庇,没有主动纠错的积极性。

丹·布莱特就因自己并未实施的谋杀罪和抢劫罪入狱长达10年。他在后来才得知,美国警方和联邦调查局自始至终都掌握真凶的情况,并以真凶信息涉及隐私拒绝披露,丹不得已通过诉讼才逼迫真实信息提交法院,最终撤销了对他的有罪判决。

无辜入狱并服刑24年的达瑞尔·博尔顿在被释放后,写下了《犯罪与因果》一诗,对司法不公提出严正控诉,“最后一次见到我的女儿时,她才七个月大,随后我就因为我没有犯下的罪行而被送到监狱”;没有人对他的24年作出解释,“那些打击犯罪的人们自己却在犯罪”;“对于那些无法偿还我24年冤狱的人们,对于那些我失去的与女儿、家人以及社区相处的时光来说,这些犯罪以及那些逃脱惩罚的罪犯们迫使社会陷于愚昧与动荡之中”。
(来源:新华读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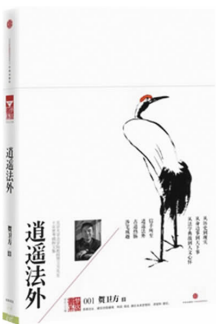
《毛主席和我们这些孩子》
作者:金戈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书作者生于延安,在毛泽东、杨尚昆、薄一波等老一辈革命家关爱下成长,并师从赵朴初、沈雁冰、胡华等教育家。她用细腻的笔墨,记录下生活中与领袖、前辈相处的点滴,感人肺腑,读来令人感慨万千。



《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
作者:程巍
出版社:漓江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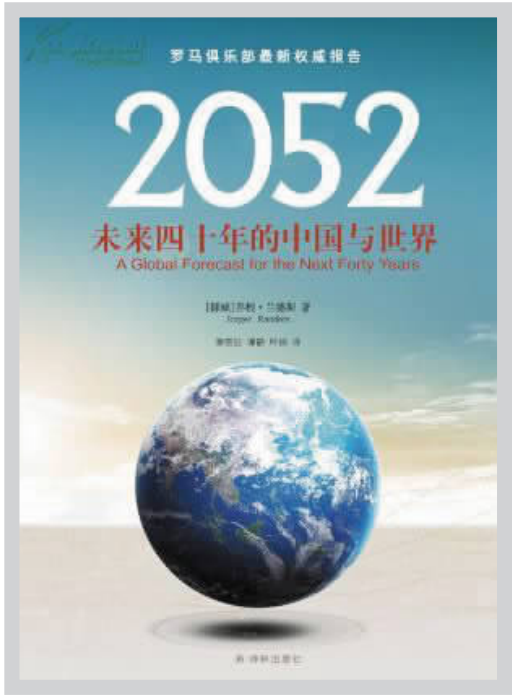
泰坦尼克号上有没有中国人呢?作者大量查阅各种历史文献,从文化学的角度,深入解析西方社会虚构泰坦尼克号上中国人“卑劣逃生经历”,丑化中国人的种种原因。本书图文并茂,尤其是对新闻报道中的虚构,进行了聚焦式的解读。



《逍遥法外》
作者:贺卫方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本书是作者集十年思索而成的最新随笔集,全书分为“书中景色”、“读史阅世”、“话语千叶”、“士林观望”、“逍遥无地”五辑,分别从时评思考、东西游历、少年追忆和人物学术等角度信手连谈。探讨体制转型困境,直言司法改革困局,揭示专制文化本质,论辩社会学术风气,传递民主自由薪火,开启公民独立思考,游历东西文化感悟,回首世事人生慨叹。

武断的判断,贫乏的想象



《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
乔根·兰德雷斯
译林出版社

乔根·兰德雷斯25岁就读麻省理工学院博士时,就参与到罗马俱乐部主持的《增长的极限》报告(1972)的撰写。罗马俱乐部借此报告提出了对世界经济和社会运行前景的悲观判断,分别提出了人口变动、食物生产、工业产出、资源使用和环境污染五方面预判,认为无节制的增长将对世界带来灾难。

《增长的极限》报告一度被认为

是被欧美精英编造出来,以打击新兴市场国家发展增长、维持发达国家既有优势,汇集了不实判断和危言耸听。但这几十年来的发展却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份报告的预判,资源危机、环境危机以及金融危机、贸易危机的叠加上演,证明既有的增长模式已经无法长期持续,甚至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导致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系统性崩溃。更让人们感到沮丧的是,应对多

重危机、推动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协作、启用足以遏制环境进一步滑向崩溃的有效机制,在目前的国际和各国政治环境中,可能性微乎其微。

乔根·兰德雷斯作为《增长的极限》报告的参与创作者,其新近推出的《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一书,就很容易被看成前一报告的续篇。这本新书对2052年的世界提出了预测,总的观点是:四十年后,全球人口增长将得到放缓,GDP、生产率、消费增长都将比预期要低,社会投资会增加,城市化程度将提高;美国为代表的现有工业化国家将成为输家,中国及其发展模式将成为赢家。

概括说起来,兰德雷斯的这番观点并不算新奇,甚至可以看成当下许多经济学家、环保人士悲观观点的集合版,并没有《增长的极限》报告在当时所反映出的惊世骇俗效应。更重要的是,《增长的极限》报告和兰德雷斯的这本书所采用的情景分析方法,即建构专有的数据模型,借助计算机运算得出未来若干年的运行结果——这种方法和运算,毫无疑问会遗漏预测时不可能获知的未来的重大技术变革和社会转折,因而只能较为精确的判断事件、问题常态化发展的动向。

《增长的极限》报告当中同样存在大量的预判错误,只是这份报告率先提出了“增长极限”、“环境危机”等概念的冲击力足够强,才掩盖了那些被认为是瑕疵的预判错误。《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这本书形成判断的依托,实际上就是当下科技水平、经济体制、金融体系及其监管体系、欧美及中国两种代表性的政治模式,可以说,这体现出一种“刻舟求剑”式的观察预测,准确度就可想而知了。举例来说,在谈及中国未来四十年发展动向时,兰德雷斯轻率的认

定中国将持续保持着现有的极高储蓄率和政府主导的高投资比率,并认为这两大优势将保证中国相比美国获得更高的增长率,也更能高效的解决资源和环境危机等问题。

《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这本书的一个重要论断是,“未来四十年里,应对面临的挑战行动过慢、措施不力将主导全球发展趋势”。这也是由欧美政治模式当下暴露出的缺陷而作出的推论,兰德雷斯仍未就此开展更深层次的探讨,比如美国的政治僵局将如何持续、政治僵局导致的政策困境所激发的改变将会是怎样的可能幅度、重大环境污染或资源短缺事件会否为激越型的改革创造足够动力,等等,而是以简化的“循环论证”得出结论。按照兰德雷斯的逻辑,如果在1920年代作出预测,决计推导出19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和1960年代的肯尼迪-约翰逊社会改革等结果。

兰德雷斯得出全球经济未来四十年将迎来增长放缓、效益降低、畸形城市化提升等结论。就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得出预判,最容易引起争论,也最可能被挑出论证和论据的漏洞。很显然,为了避免陷入这方面的口舌之争,兰德雷斯并没有具体谈及经济增长方式、形态、经济与技术相互影响的方式等问题,在讨论生产力增长及其障碍时,还暴露出他对当下的新技术动态、环保技术知之甚少的一面。

自然,《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这本书也非一无是处,至少兰德雷斯在书的结语部分提出的一项建议,就很值得我们重视:“人类文化多样性消失的速度,似乎比生物多样性更快……在世界奇观被人群毁灭之前,去参观一下吧。”

(来源:新华读书)